

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

张钊贻

摘要:“神化”鲁迅一般是指夸大鲁迅的革命思想和跟共产党的关系,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有公认的贡献,同时也被指“神化”鲁迅。冯雪峰“神化”鲁迅,抵制了“左联”内部反对鲁迅的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维护了鲁迅这面即将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进步文化的旗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鲁迅研究建设成显学,保卫了鲁迅的真思想精神。尽管任何“神化”都应该反对,但如果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新中国精神文化恐怕就没有鲁迅,这将是莫大的损失。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

关键词:鲁迅;冯雪峰;“左联”;“两个口号”论争

一、所谓“神化”鲁迅

“神化”是把并非“神”的“化”成“神”,具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是个贬义词。所谓“神化”鲁迅,意思大约是指夸大鲁迅思想和作品的革命性,夸大鲁迅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并由此而夸大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人物评论的准确性与正确性^①。就目前研究所知,这种“神化”的议论早在鲁迅逝世后就有人提出批评,最先是陈独秀,后有一个叫梅子的,直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神化”。20世纪50年代又有曹聚仁(1900—1972)要把鲁迅从“神”还原为“人”,并因此批评了大部分左翼论者的鲁迅论,其中就包括冯雪峰(1903—1976)^②。但在国共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在后来冷战两个阵营泾渭分明的对立背景下,各方对“神化”鲁迅的议论,大抵一贬了之,把“神化”的微妙作用完全淹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对“神化”鲁迅的背景和动机既不屑分析,对“神化”鲁迅效果的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探讨。

1979年,由于茅盾(沈雁冰,1896—1981)一篇答记者问,在中国鲁迅研究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神化”鲁迅的讨论^③。产生这场争论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简而言之,是“四人帮”倒台后,需要拨乱反正,而“文革”利用鲁迅打倒一大批文化人,鲁迅好些论断若不予重新评估,自然影响他们的平反。然而,中国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触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以来复杂的人事关系,或所谓“宗派主义”矛盾。事情的真伪是非,常常跟人事的亲疏好恶纠缠不清。还有,鲁迅言论的正确性,还牵涉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在当时还是个非常敏感和严重的问题。

作者简介:张钊贻,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23)。

① 有关主要文章,见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9—137页。

② 详见王得后:《所谓“神化”鲁迅》,载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第116—131页;曹聚仁:《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第165—170页。

③ 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第1—3页。最具代表性的回应,除前引王得后《所谓“神化”鲁迅》,还有新闻《“神化”及其他》,均载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42页。

值得注意的是,跟曹聚仁一样,茅盾答记者问中也点名冯雪峰,批评他“感情用事”,要在鲁迅治丧委员会中列名毛泽东,以显示鲁迅的伟大。由于冯雪峰和鲁迅跟周扬(1908—1989)等在20世纪30年代众所周知的对立,茅盾的答问自然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未能立即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已能够逐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冯雪峰在鲁迅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也是公认重要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①。如果说,冯雪峰在他的研究和回忆中,把鲁迅塑造成一个跟共产党员一样的革命战士,那么,他在“神化”鲁迅的过程中显然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神化”工作也不再为论者所避讳。任何的“神化”肯定都应该否定和批评。然而,他广泛得到承认的贡献,与“神化”即歪曲与利用的否定,这两者之间,是否互相矛盾?但冯雪峰的矛盾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对其“神化”的背景、动机和意义进行探究的兴趣。其实,冯雪峰“神化”鲁迅并不顺利,遇到来自鲁迅本人和共产党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抵制,使得他的“神化”工作更值得人们思考。我们如何去理解和解释或化解冯雪峰这个两边不讨好的矛盾?笔者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是理解冯雪峰对鲁迅遗产真正贡献的关键。

二、从认识了解到共同战斗

冯雪峰并非一开始就认识鲁迅的意义。1925年春,冯雪峰到北京并在北大旁听,当时鲁迅在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学理论,他虽“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讲课”,但更用心的是学日文。他觉得鲁迅是个“很矛盾的人”,很难接近,而他更看重李大钊(1889—1927),认为李才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②。1928年,在创造社和太阳社围攻鲁迅的时候,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虽然意图是维护鲁迅,但把鲁迅归结为“同路人”,亦可见他对鲁迅原来的评价不太高^③。后来通过与好友柔石(赵平复,1902—1931)多次倾谈,尤其是跟鲁迅合作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冯雪峰才逐渐更深入地了解鲁迅,并对鲁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确“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证人”^④。

另一方面,鲁迅也不是一开始就跟冯雪峰紧密合作。鲁迅当初把冯当成“创造社一派”的人^⑤。他们的紧密合作关系由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革命文学”论战批判鲁迅,影响不好,中共高层介入,要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并与鲁迅联合^⑥。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冯雪峰属于代表“鲁迅方面”的人^⑦。1931年柔石牺牲后,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关于冯雪峰和鲁迅的合作,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

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初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文中的“F”和“这青年”就是冯雪峰。鲁迅还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⑧从中我们可以看

① 比较系统又全面的介绍,参见刘清:《冯雪峰与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0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32—133页。

③ 《雪峰文集》第2卷,第287—292页。

④ 倪墨炎、陈九英:《本书编辑说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⑤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130页。

⑥ 参考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55—168页。

⑦ 见《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第548页。

⑧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7—248页。

到,鲁迅欣赏冯雪峰实干苦干的精神,也因此政治上信任他、支持他。有意思的是,冯雪峰如何对待和要求鲁迅。冯雪峰也知道有点“强迫命令”^①,简直是以“党外的布尔什维克”^②来要求鲁迅了。冯雪峰对鲁迅一点都不“尊重”。但鲁迅显然并不介意,至少在当时如此,在与冯雪峰合作时如此。

三、鲁迅与共产党的桥梁

对于冯雪峰在鲁迅研究的贡献,论者都指出他是鲁迅和共产党的桥梁^③。首先是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桥梁。瞿秋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1930年瞿秋白回到上海,翌年5月初在茅盾家中遇见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冯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开始关注并参与左翼文化战线的工作。瞿秋白在上海时,冯雪峰就是瞿和鲁迅的主要桥梁之一。冯雪峰对此有一段很扼要的回忆:

在这时候,两人不但还没有见过面,并且也没有什么通信,来往的只是事务性的条子,大半事情都是经过我在口头上替他们相互传达和商量的;但他们中的友谊却早已很深了。^④

两人见面及通信后,合作更加紧密,而冯雪峰已不只是桥梁,而是与他们一起共同战斗。不过他们的合作在内部并非一帆风顺,稍后再论。冯雪峰除了为瞿秋白和鲁迅搭了桥梁,也为鲁迅和另外两位中共领袖张闻天(1900—1976)和毛泽东搭了桥梁。鲁迅虽然也见过李立三(1899—1967),但两人似乎没有共同语言,一见就完。冯雪峰参与安排了会面,却是无从搭桥^⑤。

张闻天早年曾从事新文学运动,较接近文学研究会和《语丝》,与茅盾有深厚的交谊。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张闻天在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目前没有张闻天跟鲁迅有过任何接触的资料。虽然如此,正是通过冯雪峰,张闻天跟鲁迅一起为纠正左翼文艺阵营的“关门主义”而合作,稍后我们还要讨论这场斗争。1933年底,冯雪峰由于被特务盯上,离开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又跟张闻天共事,虽然跟鲁迅没有什么关系,但从张闻天就调瞿秋白回苏区一事征询冯雪峰的意见,可见张闻天是很重视冯雪峰的意见的,至少就上海文化战线的事情上是如此,而中共三个悼念鲁迅逝世的文件,即《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和《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估计也是张闻天起草,而平津和上海悼念鲁迅的群众运动,也是他具体指示。张闻天制定这三个文件应该参考了冯雪峰的意见,也就是有冯搭桥,虽然中间应该还经过潘汉年。1940年在延安,张闻天积极支持刘雪苇(1912—1998)编辑出版鲁迅文集,并为之序。1966年“文革”风暴中,鲁迅为革命的远大目标而牺牲自己的言论,显然成了张闻天的精神支柱^⑥。

冯雪峰在瑞金期间,还与毛泽东有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当时,毛泽东正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构。据说,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特意到冯雪峰的住处说道:“只谈鲁迅。”毛泽东先谈了对鲁迅作品的看法。他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小说,其中重点评价了《阿Q正传》。冯雪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移

① 楼适夷:《怀雪峰》(1941),转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② 毛泽东:《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③ 例如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51页起。

④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224页。

⑤ 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雪峰文集》第4卷,第495—496页。中共领导人当中重视鲁迅的还有王明。1936年王明得悉鲁迅病重,征得季米特洛夫同意,找潘汉年安排鲁迅到苏联养病,但为鲁迅婉拒。鲁迅逝世时王明发表悼念文章,引用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所以冯也算为他起了搭桥作用。参见王明:《中共50年》,徐小英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英译本 Wang Ming, *Mao's Betrayal*, trans. Vic Schneiers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261; 王明:《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新文出版社编:《鲁迅新论》,香港:新文出版社,1938年,第1—8页。

⑥ 关于张闻天与鲁迅联系的史实,根据程中原:《没有私交的深情——张闻天与鲁迅》,《说不尽的张闻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6—479页。

居上海后所写的杂文,尤其重点说了几次论争中的文章。当冯雪峰说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时,毛泽东颇惊讶,但说“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冯雪峰还向毛泽东讲鲁迅对毛泽东诗词的观感,谓有“山大王”的气概^①。冯雪峰在讲与毛泽东论鲁迅的故事时,还自称是个“毛派”^②。

自从柔石和瞿秋白牺牲后,中共内部推崇鲁迅而又能够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有深刻了解的人,只有冯雪峰。由于冯在左翼文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对他的倚重,以及他跟毛泽东一段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所树立的鲁迅比瞿秋白的文章在中共内部更有影响力。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称鲁迅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③

出自共产党领袖的这样的评价,自然是非常的高;而《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得出“三家”的评价,显然也并非表达毛泽东个人的观点,而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④,其中应该有冯雪峰的贡献。冯早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一文中,就说过鲁迅“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者,文学革命者,参加了那时的革命运动”^⑤。然而冯雪峰推崇鲁迅的事业跟他后来的命运一样,遭遇了各种艰难和曲折。

四、“神化”鲁迅的背景和动机

“左联”成立当初代表“鲁迅方面”的,除鲁迅本人外,就只有冯雪峰和柔石,仅占发起和筹备人数的四分之一^⑥。多数人其实对鲁迅颇不以为然。有人认为鲁迅的见解都是老生常谈^⑦;有人认为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是泼冷水^⑧;也有人因为鲁迅“只会写写文章,不能作实际工作”,便认为“鲁迅矛盾的路,是已经过去了的路,我们不必重复他们的路!”^⑨茅盾在回忆录中指出,“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⑩。可谓点中问题的关键。对于这党员与统战对象的区别,究竟只是“左联”内部一些人的态度呢,还是同样也反映了介入“革命文学”论争的中共领导层人物的想法呢,我们并不清楚,但从日后发生的事情看,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似乎并非偶然出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领导层和基层都一样。冯雪峰则不同,他不作区别,真诚地推举鲁迅为“左联”的“首脑”,“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⑪。

①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官司的一次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另见唐棣:《追怀雪峰》,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93—96页。

② 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165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58页。

④ 张闻天也采用此说,见其《〈鲁迅论文选集〉序言》(1940年10月),《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⑤ 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雪峰文集》第4卷,第22—24页。

⑥ 《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第548页。

⑦ 冯雪峰:《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雪峰文集》第4卷,第536页。

⑧ Agnes Smedley, *China Correspondent* (London: Pandora Press, 1984), 63. 按:此书原名 *Battle Hymn of China*。

⑨ 周文:《鲁迅先生与“左联”》(1940),《周文文集》第3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351页。

⑩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⑪ 冯雪峰:《回忆鲁迅》(1952),《雪峰文集》第4卷,第164页。

为了维护鲁迅,树立鲁迅的领袖地位,冯雪峰在“左联”做了大量工作。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所作的简单讲话,当时其实并无记录,是三、四天后冯雪峰根据记忆,并结合平日与鲁迅谈话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这是冯雪峰为鲁迅起草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文章的开始,使鲁迅在政治上更符合党的路线政策,也可以说,是他“神化”鲁迅工作的开始。

在1931到1933年间,冯雪峰在党内文化战线上,先后担任过中共“左联”党团书记(1931年2月)、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1932年2月)、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6月)等领导职务^①,而且,冯雪峰对鲁迅的看法得到在党内享有威望的瞿秋白(1899—1935)的认同和支持,尽管如此,鲁迅在左翼文坛仍然无法摆脱种种敌意,最具代表性的事例,莫如关于《汉奸的供状》之争。

1932年10月“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冯雪峰作为“文委”书记为此批评主编周扬,但周扬不接受他的批评,两人吵了起来。鲁迅“从公意”——也就是应冯雪峰的要求,写成《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932年12月)一文,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至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荫(田汉,1898—1968)、郭冰若(钱杏邨,1900—1977)、丘东平(1910—1941)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很可以说明鲁迅地位的实况。

从目前已知的事实,鲁迅这篇文章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1932年11月,当时在上海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左翼文艺运动排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人”,“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认为对他们不应该“谩骂”,而是“说服与争取”^②。于是发生冯雪峰与周扬为《汉奸的供状》吵架一事。冯除了请鲁迅写文章,还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其中《并非浪费的论争》一篇由瞿秋白代笔^③,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的期望。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鲁迅,留下了一篇手稿《鬼脸的辩护》(1933),应该也是应冯雪峰的要求而写,但不知何故,文章当时没有发表^④。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又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转载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化》。简而言之,冯与周扬争吵,以及鲁迅后来接受批评《汉奸的供状》的“任务”,都是配合落实张闻天改变“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奇怪的是,鲁迅的文章竟然即时便引起“左联”党员的反对,而冯雪峰亦因此与当时《文学月报》的主编周扬结怨,造成“排斥和攻击鲁迅”的“开始”,也种下日后的祸根^⑤。

① 以上年月按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② 《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307—312页。

③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第558页;首甲、方荫、郭冰若、丘东平:《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193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767—769页。丘东平一向反对鲁迅,当时草拟了质问信到处找人签名(聂绀弩:《东平琐记》,《聂绀弩全集》第4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49页)。鲁迅曾提出质问,但结果是“不得要领”(《致萧军信[1935年4月28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9—120页)。方荫及郭冰若等化名,据巴一熔、黄炜编:《黄源楼迺夷通信集》(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此说不知何据,但广为研究者接受。另,李何林曾称方荫是钱杏邨,已由钱纠误(《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④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121—124页。鲁迅和瞿所谓“辱骂”并非指“叭儿狗”之类政治用语,而是诗中的粗言秽语:“放屁,禽你的妈,你祖宗托落兹基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见《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1月),第88页。首甲他们显然奉行“革命文学”论战中创造社一些成员主张的骂人的“新流氓主义”,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0页。徐庆全称鲁迅“行文中也可偶或发现”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未知具体所指。

⑤ 冯雪峰:《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雪峰文集》第4卷,第536页;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12—13页。

夏衍(1900—1995)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把张闻天的文章“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传达?”^①徐庆全设法解释夏衍的疑问,认为由于冯雪峰没有传达张闻天的指示,只是命令周扬执行,周扬思想不通,所以两人吵了起来^②。但这不符合冯雪峰的说法,冯说他向周扬“提出我的看法”而周扬“完全不同意”,并非他下令而周扬不执行。“命令”的说法也与周扬自己的回忆不符,周扬说冯“批评”了他,而他不“接受”^③,可见冯雪峰并没有简单的“命令”,两人是有过争论,有过观点的交锋。从冯雪峰后来动员瞿秋白写文章支援,以及转载张闻天的文章来看,他请鲁迅写批评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改正作用,反而导致相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首甲他们的文章并非完全用旧有阶级斗争的论述来批评鲁迅,因为文章开始就提到“过去,普洛文化运动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但认为关门主义的错误是把群众关在门外,而不是对“革命贩卖手斗争太残酷太不客气”。显然,他们并不认为那首诗是张闻天所批评的“谩骂”。且不说这些反批评根本没有回应鲁迅批评辱骂与恐吓的要点,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文艺界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但他们怎么知道呢?既然那是张闻天首次向文艺界提出,那么他们只有两种途径得知此事:(一)他们看到或听到张闻天文章的内容(亦即冯雪峰已经做了某种传达,不管是什么方式);(二)周扬向他们复述了冯雪峰的看法(也就是周扬导致他们写文章,不管是否有意)^④。夏衍和徐庆全都否定这两种可能性,但没有提供证据^⑤。事实上,周扬是知道张闻天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的^⑥,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他跟冯雪峰争吵之前还是之后的事情。

回到首甲他们批判鲁迅一事,其实此事反映了“左联”内部问题的关键。1934年秋当过“左联”组织部长的王尧山(1910—2005),在评论周扬和胡风的矛盾时认为,他们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不同态度而发生的”^⑦。从首甲他们批判鲁迅一事看来,王尧山所察觉的问题显然并不限于周扬与胡风之间的纠葛,实际上是“左联”内部一直以来的主要矛盾。首甲他们批判鲁迅,看来就是这种矛盾和态度的反映。他们对鲁迅有成见,不管鲁迅说什么,也不去分析说得对不对,只因为是鲁迅说的,就奋起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对抗“左联”内部排斥鲁迅的倾向,冯雪峰多方设法表现鲁迅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营造鲁迅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也就并不奇怪了。这就是冯雪峰“神化”鲁迅的背景和动机。

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工作之一,是为鲁迅起草和修订文章,主要是牵涉到政治和党的政策的文章,前面已提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其他的重要文章和修订,我们知道还有《论“第三种人”》,文中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冯雪峰加的,冯“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个后路”^⑧。鲁迅的“遗嘱”《死》,也经冯雪峰建议修订两处,包括第五条不做文学家或艺术家之前,加上“空头”的定语^⑨,减少原来的偏激。最重要的文章,自然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三篇,文章借鲁迅之名,阐述党的政策,牵涉很多问题。首两篇是冯雪峰起草,鲁迅大抵没有修改,倒底算不算鲁迅的文章,也有争议,稍后再论。

① 程中原:《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68—173页;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43页。陈早春和万家骥对夏衍的怀疑解释为“意谓冯雪峰有意封锁了张闻天的文章,心里怀有什么鬼胎”(《冯雪峰评传》,第136—138页)。

② 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19—28页。

③ 《周扬自传》,黎之:《文坛风云续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④ 冯雪峰认为“这件事显然是同周扬有关系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资料》,《雪峰文集》第4卷,第540页)。

⑤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43页;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17—21页。

⑥ 《周扬自传》,黎之:《文坛风云续录》,第412页。黎之在《周扬谈自己及其他人》一文中,亦记下周扬说自己犯过关门主义错误,“当时洛甫写过文章批评过他”,但黎之“不知是指哪篇文章”(《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⑦ 王尧山:《鲁迅·周扬·胡风》,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

⑧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第559页。

⑨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263—264页。

此外,冯雪峰也营造鲁迅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不过,现已多为研究者所质疑。例如所谓送火腿给毛泽东,其实不是鲁迅主动提出要送,而是冯雪峰顺便送^①;发贺电给中共中央祝贺长征胜利,冯说得煞有其事,现在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质疑^②,虽然事情应该并非冯捏造出来的,因为有当时的文章和电文的记述^③,并不能算在冯个人“神化”鲁迅的账上,虽然他的回忆有较大的影响;又如在鲁迅治丧委员会列名毛泽东,据分析,此为冯雪峰自作主张,并不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④,等等。而且,冯雪峰塑造鲁迅与共产党亲密关系的一些事例,也前后不一致,或不完全符合事实。例如,他在《回忆鲁迅》中记述鲁迅编瞿秋白《海上述林》的感想,只记了“纪念他”,但据冯向其他人忆述,当时其实还有“纪念我”一句,因鲁迅知道瞿秋白受共产党内左倾宗派主义的打击,终于牺牲,所谓纪念自己,意谓也有可能遭到同样的迫害。但冯在书中故意漏记,以展示鲁迅与共产党亲密无间。又如,冯在1944年《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段》中,记述鲁迅说过愿意为民族的社会的革命做一名战卒,这段话到了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上下文变成了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做一名小兵,意义大大缩小了^⑤。

然而,至少在1937年之前,大概由于冯雪峰熟悉上海文坛,以及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加上他在长征中的表现,中共领导层对他甚为信任和支持,也明显重视及采纳他的意见。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就是证明^⑥,此信看来是对冯雪峰工作汇报的回复。不过,冯雪峰所谓张闻天特别嘱咐他要先找鲁迅^⑦,其中恐怕并非完全出自张闻天的决定,而更多的可能是反映了冯雪峰的意向。换言之,中共领导层对“左翼”文化界及鲁迅的态度,主要是以冯雪峰的意見为决策的依据。当冯雪峰回到上海,发生“国防文学”的论争,情况便逐步产生变化。

五、“两个口号”论争和鲁迅逝世的转折点

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者众说纷纭。前者是周扬他们依据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而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名词其实早在1934年便由周扬在介绍苏联文学时引进^⑧。大约在1935年秋,夏衍从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处看到发表

① 其实鲁迅只是送编好的《海上述林》,因冯手头上有点钱,就顺便以鲁迅的名义送火腿给毛泽东。不过,此事冯应该是征得了鲁迅的同意。见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1972),《雪峰文集》第4卷,第498页。参照朱正:《被虚构的鲁迅——鲁迅回忆录正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第237—240页。

② 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第4卷,第85,229—230页。但所谓“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的电文甚至发贺电此事的真实性本身,已越来越受到质疑。参考王锡荣:《鲁迅给中共中央致过贺电吗》,《鲁迅生平疑案》,第298—320页;倪墨炎:《此信不应编入新版〈鲁迅全集〉》、《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关于“鲁茅信”的争论及其句号》及《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见其《真假鲁迅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

③ 参考程中原:《没有私交的深情——张闻天与鲁迅》,《说不尽的张闻天》,第472—473页。不过,所引杨尚昆当年文章,其中有“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这样的句子,很难想象是出自鲁迅之手,也不像萧军的文笔,倒像写天狗吃月那类诗人的文风。而且这种常见基督教表达奇迹的比喻,更像是翻译西方人的文字。所以,鲁迅对于贺电或贺信是否参与起草,甚至仅仅与闻其事,都值得怀疑。当然,也不能排除史沫特莱取得鲁迅同意,由她草成,再由她的中文秘书冯达(译音)翻译成中文,然后以鲁迅和茅盾的名义发出。参考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鲁迅研究资料》(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73页;冯雪峰在1972年答上海鲁迅纪念馆问时,也说是史沫特莱搞的。见王锡荣:《鲁迅给中共中央致过贺电吗》,《鲁迅生平疑案》,第302—303页。

④ 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1972),《雪峰文集》第4卷,第497页。茅盾说此事是冯“做主”的,并责冯“感情用事”(《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号,第2—3页)。不符合中共意图之分析,见周楠本:《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情况》,《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10日。

⑤ 倪墨炎、陈九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164、196页。

⑥ 《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1936年7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⑦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页。

⑧ 周扬:《“国防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120页。

《八一宣言》的《救国报》，稍后周扬也从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通讯》中得悉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发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①。《八一宣言》倡议建立“国防政府”，无疑使周扬更相信自己提出“国防文学”的正确性。

《八一宣言》虽然由王明(陈绍禹,1904—1974)主持制定,但得到中共中央认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派林育英(1897—1942)回国,林育英化名张浩,从外蒙潜回中国,经过月余到达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八一宣言》的精神。中共中央即于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精神即以《八一宣言》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于《八一宣言》,就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中共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便已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并非与《八一宣言》完全一样;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即使在《八一宣言》之后,实际上还经过不同阶段的调整,并非一直一成不变。

据王建英《中国红军史考评》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即于1932年春,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愿与各地军队(按:相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订立停战协议。所以,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有明文提出,策略与后来的亦有差异,但其政策和精神其实已经出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抗日^②。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能够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中得到很好地贯彻实行^③,但我们可以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成为中共的政策,而“民族革命战争”则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主要组成部份。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以“反蒋抗日”为开始的,这里的“蒋”自然并非仅仅是蒋介石个人,而是代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因为“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主义”被认为是卖国行为。在瓦窑堡会议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经历了“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期间还有短暂的“拥蒋抗日”)、及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不公开的“反蒋抗日”等阶段和变化。“反蒋抗日”“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地方军阀反蒋抗日行动的立场和政策。“反蒋抗日”是支持地方军阀反蒋抗日行动,“逼蒋抗日”是对地方军阀的反蒋行动保持中立,“联蒋抗日”则不支持这些行动。“联蒋抗日”显然把蒋介石政权当成主要统战对象。由于政治情势的急速变化,对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掌握,有

① 《八一宣言》原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8—525页。关于周扬和夏衍接触到《八一宣言》的过程，见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58—62页。很多回忆录都称《救国时报》，《救国时报》前身是《救国报》，因遭禁，遂改名《救国时报》出版，《八一宣言》登在该报改名之前。据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97—198页。

② 王建英：《中国红军史考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7—338页。胡风在回忆“两个口号论争”时也指出了这一点（《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第338页）。

③ 十九路军拒绝在福建剿共，成立人民政府，联络中共准备签订协议，共同反蒋抗日。中共派潘汉年签订协议，但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在1934年1月失败了。参考张云：《潘汉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120页。范艳娥指出，鲁迅对福建人民政府是有保留的，认为那是军阀狗咬狗，而且对他们镇压“意见不同”的人表示了愤慨，并因此规劝一位学术刻的青年不要到那边去。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怀疑态度跟当时中共的“左”倾关门主义显然很相似。范虽然指出“四·一二”清党对鲁迅的影响，但认为鲁迅“偏激”，设法解释之余，也只能引用后来答徐懋庸的信来证明鲁迅是支持统一战线的（《鲁迅与福建事变》，《上海鲁迅研究》2001年夏之卷）。笔者认为，鲁迅从平民百姓的角度去怀疑，跟中共作为一个拥有军队的政府去怀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鲁迅的怀疑不涉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根本与统一战线无关，如果他反对中共派人去谈判和签订协议，那才算是反对统一战线。

时似乎令中共领导层本身也来不及达到一致的认识^①。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八一宣言》中称“南京卖国政府”以及把蒋介石列为“卖国贼”,可见这个宣言实际上还是号召“反蒋抗日”^②。而冯雪峰在1936年4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上海,时间上属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折阶段^③。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复信,其中认为“目前一切反蒋的发动”,即反对最大汉奸卖国贼,必然在抗日口号下进行^④,也正是“反蒋抗日”政策的体现。事实上,1936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指示不提“抗日反蒋”,虽然称已于“二月开始改变此口号”^⑤,但明文确定的时间是在九月,离鲁迅逝世不过一个多月,因此,鲁迅逝世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可以说是属于“反蒋抗日”的阶段。

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上是两种政治取向的斗争,其影响远超出当时的文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常被概括成“两条路线斗争”,但从冯雪峰等当初新口号提出的目的,以及当时中共政策演变的过程看,所谓“路线斗争”之说似乎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忽略了问题的焦点。要了解论争的实质和焦点,我们似乎应该先分析一下冯雪峰当时面对的问题。

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带着“反蒋抗日”的政策指示从陕北回到上海,翌日即住进鲁迅家中,鲁迅一见到他,便表达对周扬等人强烈的不满,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⑥。冯雪峰离开上海前,已发生首甲等批判鲁迅一事,此后令鲁迅不满的事情也真不少,举其大者,1934年即有廖沫沙(1907—1990)化名批评鲁迅有“买办意识”^⑦,田汉(1898—1968)化名批评鲁迅与叛徒“调和”^⑧;胡风(张光人,1902—1985)当“左联”书记期间,为“左联”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写信汇报,其中高度赞扬鲁迅,周扬等人则认为“不正确”^⑨;还有“四条汉子”通知鲁迅胡风不可靠;再就是“左联”解散的问题,鲁迅本不同意,后来接受大家的意见,只要求发个宣言,结果周扬他们连宣言都不发^⑩。其实,自从冯雪峰离开上海,胡风1934年10月辞去“左联”书记之后,“左联”基本上已不再联系鲁迅,连刊物都不给他看^⑪。就在冯回到上海的前一天,鲁迅拒绝加入周扬他们发起的作家协会(后改名为文艺家协会)^⑫。冯雪峰是希望他参加的,但劝说无效^⑬。冯开头以为鲁迅对中共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于是向鲁迅传达和解释,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新政策的理解。过了两天,冯雪峰便和胡风、鲁迅

① 各阶段的相关文件依次见《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1937年4月4日)、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89—91、176—177、560、595—596、606—607页;第13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第2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但在张闻天起草“逼蒋抗日”指示之前,毛泽东已于1936年8月26日致电潘汉年,指示“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广祖辑录:《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共产国际对中共1936年“两广事变”立场的批评,可能促成中共从“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121页)。

②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与“反蒋抗日”的相关文件,有《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8—519、589—597页。

③ 据说,他在临行前夕与毛泽东彻夜畅谈,可能得悉“联蒋抗日”的精神。见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第205页。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只提“逼蒋抗日”(《雪峰文集》第4卷,第229页)。

④ 《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1936年7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⑤ 毛泽东:《抗日反蒋不能并提》,《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8—439页。

⑥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页。

⑦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7页。

⑧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147—148、212页。

⑨ 胡风:《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3页。

⑩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6—89页。

⑪ 关于刊物,见《致曹靖华信(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信(1935年2月7日)》、《致徐懋庸信(1936年5月2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1、46、365页。对照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15页。

⑫ 《致何家槐信(1936年4月24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3页。

⑬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21—322页。

商量提出新的口号。

左翼作家中不喜欢“国防文学”口号的人不只鲁迅,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口号呢?鲁迅对这个口号的提倡者,在执行联合战线政策时不分敌友,接纳“忏悔者”,显然不满^①;楼适夷(1905—2001)说“国防”使人联想到国民党政权,引起“生理的厌恶”,他们的观感有一定的代表性^②。事实上,《八一宣言》发起成立“国防政府”,并非共产国际或王明的发明,“九·一八”事变后“国家主义派与新月人权派”就提了出来,当时被中共批判为拥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③。当然,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国家主义派等提倡的是国民党政府领导、各地方势力和政治团体一概俯首称臣的“国防政府”,而《八一宣言》则是要联合除卖国的国民政府以外所有抗日力量的“国防政府”,而且中共显然要争取成为主导的统一战线的力量。然而,在没有解释清楚也未有实践表明,的情况下,楼适夷他们对此产生“生理的厌恶”,并不奇怪。而且,“国防文学”口号本身也的确有问题,《八一宣言》发起成立“国防政府”,但这个“政府”还远远没有成立,便提倡“国防文学”,是否为时过早,引人误会?正如胡风指出,“国”在当时一般人眼中,自然代表国民党的“国”,既不符合东北抗日的现实,也不符合“反蒋抗日”的政策^④;其次,周扬他们提出“国防文学”就是要写“国防”题材,这样的解释也不符合团结抗日作家的目的,因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目标是要把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⑤,周扬他们的解释却把不写“国防”题材的作者排除在外。不过,这些问题本来也可以通过论争和辨正来处理,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呢?

楼适夷称,冯雪峰告诉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按:原文作“民族解放战争文学”)的口号是冯从陕北带来的^⑥,如果不是他理解错误,恐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主要是建立情报网,推行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为重建上海地下党做准备,文艺界只是“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统一战线的政策^⑦。(夏衍质疑冯所说的四个任务,稍后再论)从冯的回忆可以清楚看到,冯对提新口号其实毫无准备,所以跟鲁迅和胡风商量,如果口号是带回来的话,则只需传达即可。

为什么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呢?胡风建议用“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因为“一·二八”事变时瞿秋白和冯雪峰写文章都用过这个词语。冯雪峰知道当时的政策与“一·二八”事变时不完全一样,但认为这个词有阶级立场,若再加上“大众”,立场就更鲜明,“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来”^⑧。“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来”这句话其实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冯对上海文艺界

① 《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致曹靖华(1936年4月23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361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239页;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载其《话雨录》,第93页。据夏衍回忆,“左联”内部有不少人对“国防政府”有疑虑,并引述文章说明在东京的郭沫若当初也不赞成,理由是一样的(《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224页)。

③ 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一九三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3页。

④ 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第337—338页。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6—538页。对照茅盾:《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周扬:《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66—569、570—575页。参见[日]丸山昇:《关于“国防文学论战”》,氏著《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页。

⑥ 巴一熔等编:《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⑦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页。

⑧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13—514页;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第333页。按:胡风回忆中提议的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所谓瞿秋白和冯雪峰都写过文章,大约是指瞿秋白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1932年3月),《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7—11页;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1932年5月),《雪峰文集》第2卷,第340—343页。按:冯的回忆强调口号的阶级立场,恐怕是受写作当时环境影响所致。冯知道“一·二八”事变“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他指的是什么“错误”?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强调了阶级斗争,如果有错,那就是把本来是统一战线话语的“民族革命战争”,变成阶级斗争的话语。不过,这种错其实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本身政策的混乱,详后述。所以,冯雪峰此处回忆其实自相矛盾,但他认识到有错误,倒反过来说明了他们当时的口号是强调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有关“左联”在“一·二八”事变时的话语混乱,参考秦林芳:《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中的民族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

的直接或主要任务是传达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不是要考虑左翼作家的的问题。当然,他也要“附带管一管”。就在他管一管后,却发现鲁迅的处境不妙。当时“左联”已经解散,鲁迅又拒绝与周扬他们合作,被周扬他们指责为破坏联合战线,身心俱惫,考虑“休息”或者另起炉灶^①。原来要树立鲁迅为“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的冯,自然首先就是要稳住鲁迅,改变鲁迅左翼文坛领袖岌岌可危的地位,于是与鲁迅商量,提出一个他可以接受的口号,也就是设法重新树立遭到周扬他们排斥、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这面旗帜。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是冯雪峰为了保住鲁迅这面左翼文化的旗帜、这尊“神”而向鲁迅做的妥协。

正因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冯雪峰临时想出来的口号,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例如口号中的“大众”,原来在左翼文坛有特指“工农”的含义,但冯雪峰和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并没有及时作出扩大内容的修订解释,以至让周扬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编者附记抓住这点,到后来才在答徐懋庸信中补充解释^②。在同一篇文章中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冯雪峰和鲁迅又说: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有益的,需要的。

虽然对象和目的都说得很清楚,是左翼文学运动在抗日联合战线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即后来在答徐懋庸(1911—1977)信中所谓,“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然而,在当时即七月,也就是胡风在六月提出新口号之后,“国防文学”派已经认为有人要来争“正统”,抢“大旗”的情况下,冯雪峰和鲁迅没有像后来那样强调两个口号的并存,而是将两者关系说成是“总的口号”下“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回顾起来,不能不认为是给对方火上加油,是策略上的失误。支持“国防文学”的郭沫若(1892—1978)在《蒐苗的检阅》中,就认为鲁迅他们当初是要以新口号取代旧口号,后来在答徐懋庸信中才说并存,语含讥讽^③。也许,冯雪峰没有料到对方反应如此之大,他大概没有想到论争实际牵涉到影响力亦即权力的问题。

然而,冯雪峰以为鲁迅“不太明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④,恐怕并非事实。查1935年王尧山(1910—2005)处理周扬和胡风的矛盾时,发现矛盾的症结其实在他们对鲁迅的态度。王尧山设法调解周、胡的矛盾没有成功,便把情况向他的领导邓洁(1902—1979)反映,邓洁是取代遭破坏的“文委”的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负责人之一,对此很重视,于是约鲁迅会面,得到积极回应。会面主要是邓洁与鲁迅商谈,胡风和王尧山偶有插话,在场的还有王的夫人赵先。按照他们的回忆^⑤,我们知道会面时邓洁向鲁迅传达了《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提议由鲁迅出面主持一个文

① 《致曹靖华信(1936年5月3日)》、《致王冶秋信(1936年5月4日)》、《致曹靖华信(1936年5月14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6、370、378页。参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19—321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39页。按:《文学界》主编挂名是徐懋庸,但这篇编者附记的作者,从口气来看,笔者认为只能是周扬。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09—719页。谌宗恕认为“并存”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实际只是“附存”(《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一种反向思考》,张国光等编:《文学与语言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关于《蒐苗的检阅》解读的争论,见叶德裕:《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廖久明:《也谈“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9期;叶德裕:《关于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

④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237—238页。

⑤ 王尧山:《鲁迅·周扬·胡风》,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第100页;赵先:《缅怀胡风忆往事》,载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4页。关于“对鲁迅先生的不同态度”,可以从胡风向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的报告看出因由。胡风认为“中国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是由鲁迅开创的,他的影响是超过一切作家的”(《若干更正和说明》,《胡风全集》第7卷,第43页),但这个报告被周扬他们认为不“正确”(《致胡风信[1935年5月17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129页)。

艺工作者协会,又建议鲁迅与周扬面谈,均遭鲁迅拒绝。邓洁虽然早已在冯雪峰之前向鲁迅传达了《八一宣言》的抗日统一战线新政策,但显然对鲁迅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既然提出新口号,冯雪峰看来也跟邓洁一样,没有能够说服鲁迅。不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鲁迅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早在“左联”成立的前夕,鲁迅就说过,在革命队伍而言,“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所以不应该要求队伍全体成员“意识”都十分正确^①。这一思路和立场,到后来批评张春桥所谓萧军不该早早离开东北的意见^②,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批评那些求全责备,实际是排斥异己的做法,亦即关门主义。从他上述支持张闻天反对“左联”关门主义一事,也可以证明。当然,鲁迅对一些策略和做法恐怕也不以为然,例如解散“左联”,徐懋庸向鲁迅解释时也许表达得不是很准确,但其中“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其实都有中共中央指示可循^③。又如,萧三(1896—1983)给“左联”信中提及的“复活岳飞,文天祥”这些“救国英雄”,却是鲁迅反对的^④。鲁迅建议“左联”秘密存在,以保护原来的盟员不被“统”过去,但胡乔木(1912—1992)指出“左联”只是群众组织,这样做就变成“第二党”,行不通,并非没有道理^⑤,但鲁迅却认为自己的意见“被一些‘指导家’格杀了”^⑥。不过,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而是做法上和策略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通过解释和说明去解决的,所以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人的问题。

胡风在回忆邓洁与鲁迅的会面时,有下面一段对话:

我们有了现代武器,何必还用原始武器呢?鲁迅马上回答: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⑦

1936年,茅盾向鲁迅转达夏衍他们对解散“左联”的解释,说解散并非取消左翼的领导,因为有夏衍他们在新组织里面当“核心”,鲁迅听到后“笑了笑道:对他们这等人我早已不信任了”^⑧。这段话可以说是“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一条很好的注释。鲁迅后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更举出不少“不信任”的具体例子^⑨。冯雪峰后来回忆:“周扬等人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利,……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却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于敌人,同敌人及其叭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不妨说是鲁迅对周扬等人观感的总结。实际上,鲁迅认为周扬他们是借联合战线招降纳叛,意图当官^⑩。鲁迅甚至质问过杨之华(1901—1973)为何不把周扬等人清除出党^⑪。这些才是鲁迅不打算加入他们“联合战线”的关键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鲁迅的看

① 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第4卷,第226—228页。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鲁迅全集》第6卷,第513—515页。

③ 参见《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561—571页。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中,指示信批评过往中共在群众组织提出跟党一样的口号,通过“革命的党化决议,吓得群众不敢进来”,并给敌人以破坏的口实;又指出“党的领导权是党的主张策略和决议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信仰,拥护和执行”,所以要取得领导权,需要与广大群众一起经过长期工作才能达到(第568—570页)。

④ 萧三关于解散“左联”的信,见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3—208页。鲁迅是反对宣扬岳飞与文天祥的,因为他们是失败的武将和亡国的文官,不应是抗敌的楷模(《且介亭杂文末编·登错的文章》,《鲁迅全集》第6卷,第571页);岳飞代表“奉旨不抵抗的忠”(《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珂德》),《鲁迅全集》第4卷,第520页)。

⑤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86—89页。

⑥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9页。

⑦ 胡风:《鲁迅先生》(1984),《胡风全集》第7卷,第102页。据说邓洁在“文革”期间也有回忆此事的文章,原文未见,摘要见吴作桥等编:《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⑧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10页。

⑨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4—535页。

⑩ 参考拙文《重读〈出关〉的现实寓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⑪ 见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511页。

法和态度,冯雪峰一度考虑把周扬调走^①。

冯雪峰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也没有能够说服鲁迅。但冯雪峰对“左联”解散的认识和立场,跟萧三和邓洁应该是一致的,即明白“左联”之类的群众组织过去旗帜都太过鲜明,不符合当时统一战线的策略。据王学文(1895—1985)回忆,冯雪峰要解散救国会里面的党团,而且没有对党团员进行说服和解释,让王学文他们意见很大^②。冯雪峰的做法似乎跟鲁迅所批评的周扬解散“左联”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冯雪峰这样做看来有他的原因,例如中共上海办事处成立,可直接跟救国会联络,而且“临委”正“自行消亡”,新的江苏省委正在成立,等等^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学文他们并不知道——冯雪峰当时也不可能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对救国会的工作已经更隐蔽,已由一位秘密党员胡愈之(1896—1986)负责,也就是夏衍所谓在新组织里面有他们当“核心”。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执行解散“左联”的是冯雪峰而不是周扬等,鲁迅的态度会怎么样?

据矛盾的回忆,鲁迅并非不了解“左联”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很严重,但认为“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左联’他们就不做了”。还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④。不单是关在门外,周扬他们还要把鲁迅推向敌对的阵营。当时由于鲁迅不支持他们的“国防文学”口号,不参加他们的作家协会,已经背后被他们指责为破坏统一战线。在冯雪峰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后,社会上就有流言说鲁迅是托派。这是冯雪峰代笔的两篇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的背景。这两篇文章由茅盾分别发给“两个口号”支持者的刊物,希望双方同时刊登,也就是希望双方表现团结。“国防文学”方面,通过编辑徐懋庸交给《文学界》。然而,周扬他们刊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时加编者附记,说托派反对“国防文学”,又拒绝刊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显然要把鲁迅推向托派^⑤。背后的“花样”及小报化名的流言,终于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登在左翼文学阵营自己的刊物上。此举可以看作公然与鲁迅和冯雪峰划清界限,也可见周扬他们对新口号以及维护鲁迅的抵触情绪是如何强烈。按照矛盾的说法,他跟冯雪峰设法把两方面拉到一起的努力,让胡风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给破坏了^⑥,到拒绝登载鲁迅反对托派的文章,双方的矛盾可以说是已经公开,及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关系几近决裂,或实际上已与决裂无二。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否真正代表鲁迅的想法和态度,有研究者表示怀疑^⑦。据胡风回忆,鲁迅只是“点一点头”,恐怕并非是很肯定的表示;鲁迅曾向他表示,代笔文章一点也不像他的东西。不过,胡风批评冯雪峰的态度,却不见得合理。胡风显然不理解当时冯雪峰“神化”鲁迅的迫切性,也不了解鲁迅的心态。鲁迅也许不满冯雪峰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一些说法,但鲁迅在四个月之后才病逝,期间肯定看过这篇文章而没有进行丝毫修改,信中脱离现实的

① 《王学文同志谈有关“两个口号”争论的一些情况》(1978年8月18日和9月9日),黎之:《文坛风云续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45页。

② 《王学文同志谈有关“两个口号”争论的一些情况》,黎之:《文坛风云续录》,第446页。

③ 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1969),载倪墨炎、陈九英编:《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59—267页。

④ 矛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10页。

⑤ 《文学界》第1卷第2期(1936年7月),见《“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第438—439页。冯雪峰说两篇文章先投给周扬和夏衍“领导”的《光明》,遭到拒绝,才托茅盾转投其他刊物。夏衍则称并无其事,并谓对鲁迅来稿求之不得(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18页;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⑥ 按:茅盾、冯雪峰和夏衍的回忆录,都是在胡风平反之前所写,他们有关胡风的部分,需对照胡风的回忆录,虽然胡风的回忆录恐怕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冯雪峰回忆1936年最糟糕的部分,在设法疏远与胡风的关系,好像两人初次见面,其实并不,已由夏衍指出(《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⑦ 朱正:《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载《鲁迅回忆录正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211页;张永泉:《关于鲁迅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关系的疑问》,《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

“高超”批评,也是鲁迅早前对托洛茨基“过于理想”的观感^①,恐怕也不好完全否定冯雪峰所谓“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成”^②。而且,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分工来看,政策部分出自冯雪峰,鲁迅没有大改,可见在政治问题上,鲁迅还是依从冯、信任冯的。然而,冯雪峰以“党外布尔什维克”来要求鲁迅,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③。这样的要求似乎超出了鲁迅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此事如果对照鲁迅和冯雪峰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合作,似乎又不一定具有代表性。

其实,尽管鲁迅在政治上信任冯雪峰、依从冯雪峰,但对冯有关自己的评价,却认为“和我自己的意思并不相同”。虽然冯的文章主要是“文学上的地位”,但也牵涉社会和思想^④。这一点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以及鲁迅对瞿秋白评价的反应。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鲁迅录何瓦琴句,书联一副以赠,视瞿为“知己”^⑤。瞿的《序言》中虽说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但论到革命者与鲁迅的关系时,称他为“诤友”,并呼吁“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⑥,处处隐藏着“我们”和鲁迅的区别,后来更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虽然是狱中受访,恐怕确是他的观点^⑦。从“同路人”到“党外布尔什维克”之间,无疑存在很大的差异。曹聚仁是赞同瞿秋白的看法的,也因此认为冯雪峰是“神化”了鲁迅,不过曹聚仁常常无视鲁迅政治上信任和依从冯雪峰的事实,也没有注意鲁迅愿意为中国的前途做出个人牺牲的立场。

回到“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由于冯雪峰后来的抉择和遭遇,因此受到不少指责和质疑,有些事情已经解决,如到上海的时间^⑧,有些还需要辨正,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性或合理性。引用毛泽东并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诚然提过文艺要“使合于国防的利用”^⑨,但他随后所说的两套办法,实际上是批评国民政府,表明那个改良人民生活 and 给人民民主自由的“国防性的政府”还没有实现,还是“反蒋抗日”或“逼蒋抗日”的话语。而且那是1937年7月周扬等人去了延安之后的事情。毛泽东在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会上的讲话时就说过“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跟鲁迅他们的口号是一致的^⑩。

① 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65页。

②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66),《雪峰文集》第4卷,第517页。

③ 胡风:《鲁迅先生》(1984年2月),《胡风全集》第7卷,第106—107页。

④ 《致普实克(1936年7月23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663页。冯雪峰的文章《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及《附记》,见《雪峰文集》第4卷,第22—26页。

⑤ 鲁迅感激瞿秋白《序言》的主因,见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附记》(1937),《雪峰文集》第4卷,第26页。

⑥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818—830页。

⑦ 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1935年7月),此篇作为附录收入刘福勤:《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18—325页。

⑧ 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见其《话雨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86—87页;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581页;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2页;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20页。另外,从毛泽东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记号看,毛泽东也是赞成鲁迅的(张贻玖:《毛主席和鲁迅著作》,《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记号为何时所做,张贻玖文中不是说得很清楚。笔者理解为记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上,应该是1938年后不久所记)。

⑩ 是否根据冯雪峰的汇报,未能确定。冯雪峰在1937年1月曾回延安汇报工作,之前有无汇报则不详。参考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指出,两个口号其实都是王明提出的,都有中央文件依据。“民族革命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共《九一九宣言》提出,虽然相应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到翌年“一·二八”事变才提出;“国防文学”根据的是《八一宣言》。但如果因此认为“两个口号”论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①,恐怕就值得商榷。首先,这并非王明的意思。王明指出并赞同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主张两个口号并存,所以,他要说明的是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原则的差别”^②,他的主旨其实在批判“文革”期间把“两个口号”的论争解释为两条路线的敌我斗争。“两个口号”的论争并非敌我斗争,这也正是冯雪峰设法维护两边团结——亦即把遭排斥的鲁迅重新树立起来的意图。其次,“民族革命战争”用的是“民族”而非“工农”,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话语,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体现。当然,它还是以反帝和反国民党为前提的。这是否就是令人感到“带有‘左’的痕迹”的地方?不是很清楚^③。中共当初提出这个口号,其实内部存在疑虑,因为民族主义原来是国民党反共的意识形态和旗帜,只是因“九·一八”事变而逐渐破产,因此党内仍需要解释和纠正^④。然而,1931和1932年间,由于把国民党当成帝国主义的“清道夫”,把一切在野政治团体当成国民党的拥护者^⑤,并因此一度对“一·二八”事变的十九路军领导者也持批判态度^⑥。所以,当时所谓的统一战线,其实只有“下层统一战线”,有名无实,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这里面有共产国际影响的因素^⑦。不过,1933年开始,情况逐渐起了变化,例如,中共已注意到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对把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的做法提出批评,也考虑到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⑧,但没有改变民族革命战争的提法。1934年,在日本加紧控制华北之际,中共中央就提出“最低限度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指示广大群众如何实际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来团结和组织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作亡国奴的分子,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在这一战线中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独立领导”^⑨。可见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是一致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民政府热衷“先安内,后攘外”,消极抗日或抗日不力,引起全国各阶层

① 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46—347页。

② 王明:《中共50年》,徐小英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3—274、276页;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46—347页。所谓《九一九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日期按中央档案馆则是九月二十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一九三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96—400页。关于王明《中共50年》,笔者也参照了前苏联官方英译本 Wang Ming, *Mao's Betrayal*, 254—255, 257—258。

③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215页。按:如果“反蒋抗日”的涵义的确是造成冯雪峰他们的口号给“国防文学”提倡者“左”的观感,那么“国防文学”提倡者的主张究竟是什么?“联蒋抗日”?跟着《八一宣言》所指责的卖国贼和卖国的政府去抗日?不是很明白。

④ 《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1931年12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一九三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530—534页。

⑤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一九三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3、41页。

⑥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1932年2月26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2年4月15日)。不过,共产国际对此提出了批评,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事变的指示》(1932年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一九三二),第142—145、609、641页。

⑦ 《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河北给河北省的信》(1932年12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1932年9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一九三二),第364—567、574页。胡乔木指出,“九·一八”事变本来是中共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转机”,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没有作出改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49页)。

⑧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1933年6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一九三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32、218页。

⑨ 《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1934年4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一九三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7—218页。

普遍不满,连军队也有要求停止剿共,北上抗日,中共发觉“客观环境”已经“有可能把一切誓死不愿当亡国奴,誓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那些忠实的‘民族武装自卫者’(或者所谓‘爱国志士’)夺取到我们方面来”,于是拟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并发出秘密指示信。这个“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提出“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发动各种色彩甚至反动的社会名流签名支持这个纲领,号召不要怕跟国民党“一切政府及商会等机关”发生关系,自然也要加强斗争。这个纲领还提出由各界及各抗日团体选出全国“武装自卫委员会”,处理人民武装抗日所有事宜。纲领后来得到宋庆龄等一千七百多人签名支持^①。红军长征打着“北上抗日”旗号,也是这个“客观环境”改变导致政策改变的结果。其中“武装自卫委员会”其实已具有“国防政府”的雏形。

对照《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仍然是主张“反蒋抗日”的《八一宣言》,其实并无太多新东西。笔者甚至估计,《八一宣言》是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基础制定的。宣言虽然发起成立“国防政府”,但所谓“国”并非国民政府的“国”,而是统一战线产生出来的“国”,是改变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后选举出来的“国”,执行起来,实质上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范畴。1936年2月,张闻天署名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停止内战,一致讨蒋抗日”,就同时使用“国防政府”一词^②。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会成立国防政府,实际上又是“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③。所以,王明说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原则的差别”,至少在鲁迅逝世前的“反蒋抗日”阶段而言,是符合事实的。更何况,冯雪峰和鲁迅已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只是“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并非面向所有作家的统一战线的文学主张。它的确是“狭窄”的、“左”的,但它的提出,是为了使原来“左”的变成统一战线的,而不是为了保持“左”而抵制统一战线。而且,他们对两个口号又实际主张并存。提出这样的新口号,既符合党的路线政策,又得到鲁迅的认同;既维护了鲁迅代表进步文艺界这面旗帜,又纠正联合战线偏离“反蒋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误解。在当时的形势下,恐怕也是冯雪峰的最佳选择。

对于冯雪峰他们提出新口号是否恰当,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很值得思考。抗日时期的文学口号,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期间,其实也有人提过另一些,如民族自卫文学和抗日反帝的大众文学等等^④。周扬他们对提出这些口号似乎并不介意。“国防文学”支持者之所以支持这个口号,主要是认为这个口号是党提出来的。部分人如郭沫若,当初还有抗拒,后来按照周扬他们理解的精神去解读《八一宣言》,认为周扬他们代表党提出“国防文学”,才支持起来^⑤。所以“国防文学”也是周扬他们作为党的代表的旗帜,这面旗帜使他们能够把相当一部分人团结在他们周围。冯雪峰他们提出新口号,情况跟别的口号提倡者不同。因为冯雪峰被视为“中央特派员”,而鲁迅还是左翼文坛的精神领袖,与周扬闹矛盾的胡风也在这一边,他们提出新口号有挑战周扬等正统权威地位的意味和效果,是很明显的。如果周扬他们坚持排斥鲁迅,新口号影响力的增强就等同周扬他们影响力的减弱。而影响力就是权力。其实,从党的立场看,在一个历史新阶段,连中共领导层也正在设法适应风云变幻的新形势,新口号的提出和论争应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例如远在天津不涉切身利益的刘少奇

① 《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4月28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248—259、681—686页。

②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10—211页。

③ 《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1936年7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④ 梦野:《民族自卫运动与民族自卫文学》、王梦野:《中国的反帝文学与国防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第6—9、91页。此外还有“国难文学”“救国文学”等等提法(第58页)。

⑤ 参考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86—88页;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224页。

(1898—1969)就认为如此,他就赞同鲁迅和冯雪峰的新口号^①。

冯雪峰曾自我批评说,提口号时没有请示中央,但正如楼适夷指出,“国防文学”口号也没有请示批准^②,虽然当时上海地下党与中央断了联系。夏衍称,他曾要求冯雪峰就“两个口号”论争向中央请示一下,冯雪峰“迟疑了一下,就点了点头”,但论争持续,所以夏衍认为冯是“不管”了^③。因为冯的“不管”,夏衍质疑冯雪峰后来提到回上海的四个任务。其实那第四个任务也只是对文艺界“附带管一管”,也许因为只是“附带”,所以冯没有跟夏衍说,而且冯即使“附带管一管”也遭到周扬他们的抵制,实际是管不了。不过,如果认为冯雪峰没有向中央请示汇报,恐怕并非事实。证据就是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复信^④。这封信是冯雪峰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前后来的三信”所得到的回复,其中包括文艺界状况。

虽然我们不知道冯雪峰汇报的内容^⑤,但从当时即1936年5、6月间的背景,以及张闻天等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主要在倒数第二、三段,程中原已做了很好的分析^⑥。首先,倒数第三段讨论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程中原指出这段“不仅是泛论,而且是同当时鲁迅的境遇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最后一句的“周君”是谁,程中原虽没点明,已呼之欲出。显然,张闻天他们同意冯雪峰批评周扬的关门主义,也就是排斥鲁迅的错误。第二段说,鲁迅和茅盾:

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所谓怀疑,从背景来看,自然是指所谓鲁迅另提新口号,破坏联合战线,是托派。冯雪峰有没有汇报“两个口号”的论争?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回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革命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如果冯雪峰的三封信都没有“请示”“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那原因大概是没有必要了罢。

“两个口号”论争到了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告一段落。冯雪峰虽然无法完全令文艺界团结起来,但他至少保住了鲁迅这面旗帜,并使鲁迅更靠近党,而不是把鲁迅排斥出去。鲁迅逝世时,中共组织动员群众送殡,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三份函电,高度赞扬鲁迅,冯雪峰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

冯雪峰对鲁迅的评价虽然一度是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所依赖的信息来源,但中共当时看来还没有确定对鲁迅的态度,又或者党内有人对鲁迅有不同看法。例如,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写信给七十位中国学界领袖阐述中共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其中有郭沫若和茅盾,但没有包括鲁迅^⑦。后来,鲁迅逝世后发生一连串事件,使冯雪峰“请假”离开共产党的前线战斗岗位,他“神化”鲁迅对中

① 莫文华(刘少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1936年10月15日),《“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第899—902页。毛泽东也承认中共领导层对新形势有争论,见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103—104页。

②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14页;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周扬到了延安后,也指责冯“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108页)。

③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212页。

④ 《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1936年7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⑤ 中共中央七月前已收到冯三封信。就目前所知,至少1936年5月28日的报告是保存下来的,此后还至少有9月12日和9月28日两份报告(见史纪辛:《鲁迅托送火腿慰问中共领导人史实再考》,《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但传闻这些报告尚未解密,不会发表在新编的《冯雪峰全集》中。

⑥ 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⑦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69页。

共的直接影响,也可以说是告一段落。

六、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地位的变化

1937年后冯雪峰离开岗位,不再受中共重用,过程和原因不是太清楚。据胡愈之回忆,1937年7月间,冯雪峰参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与代表团成员博古(秦邦宪,1907—1946)吵翻,认为“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从南京跑回上海表示“不干了”^①。冯雪峰1936年便受命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还同张子华一道在上海联系国民党做工作^②,肯定知道“联蒋抗日”的新方针,为什么还会跟博古冲突,实在费解,而且发生在经南京上庐山的途中,还未谈判就说是投降,也未免愤慨得不合情理,虽然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原因^③。张闻天8月8日致电冯雪峰,要冯在20日前回延安“讨论时局问题”,但冯没有去。8月25日洛川会议决定调冯雪峰回延安,张闻天在10月16日、22日致电博古谈及此事。10月23日,张闻天致信给潘汉年(1906—1977)转冯雪峰,再要求冯雪峰到延安开会。但张闻天九月后的电报还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上海所有来人没有一个满意他的”,“上海来人对于你在上海文化上的领导均不满意”,这跟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1898—1976)的函电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冯雪峰的肯定,成鲜明的对比。程中原因此认为胡愈之的回忆可能有误,冯赌气不干应是九月,“其原因就又牵涉到上海文化工作问题与人际关系”,并非与博古吵架后决定^④。然而,张闻天所谓的“时局”,自然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冯雪峰对“时局问题”有看法,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上海来人”可能使矛盾进一步加深。

陈早春及万家骥指出,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但到了1937年8月两人关系有点紧张,很少找对方,以至冯手头的一些工作都移交给新成立的江苏省委,成了一个多余的人。陈早春等认为,冯雪峰与潘汉年的紧张关系跟南京吵架一事有关^⑤。据胡愈之说,他把吵架一事告诉了潘汉年,而潘对冯雪峰在谈判还未成功就跑掉,非常气愤^⑥。这个说法似乎指潘汉年跟博古立场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潘汉年还为另一事气愤。同年9月他给中央电报,谓听了冯雪峰转达博古对他的批评,表示不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代替他。而博古对他的批评,是针对他对国民党抗日可能性估计不足,对联合国民党抗日方针发生动摇^⑦。据此,冯雪峰和潘汉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会有太大分歧,但他们的矛盾却与“上海来人”有关。

涉及冯雪峰的“上海来人”至少有两批,但关系到“两个口号”论争的是第二批。第一批是王学文和邓洁,由冯雪峰经手把他们送到延安,于1937年春送达。他们在延安反映对冯的不满。周恩来在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前,指示刘晓(1908—1988)重建上海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分三类,一类送延安^⑧。第二批“上海来人”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由潘汉年经手。

1937年6月潘汉年与夏衍详谈,并在9月跟周扬谈话后把周扬、李初梨(1900—1994)、周立波

① 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② 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③ 唐弢:《追怀雪峰》,载《回忆雪峰》,第108—109页;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341—342页。

④ 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有关函电见第4—7页。电报日期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53、357页。

⑤ 据冯雪峰《自传》,转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248页。

⑥ 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包子衍等编:《回忆雪峰》,第73页。

⑦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第343页。

⑧ 见仇学宝、于炳坤:《魂系上海——刘晓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90页。

(1908—1979)等十二人送去延安,周扬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①。这一批自然也不会说冯雪峰好话。而冯雪峰没有接受张闻天的建议去延安解释他那方面的情况,也很可能没有看到张闻天10月23日的信,但他肯定知道中央要调他回延安的决定,并选择了“请假”写作,离开岗位。陈早春及万家骥还指出,潘汉年复电中央虽与刘晓联署,应出自潘一人之手,电中称冯雪峰“不告而行”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冯到12月20日才离开上海,潘的复电使中央无法再接触冯,而潘亦主动切断联系,“做得名正言顺,连传递信息的工作也懒得做了”^②。换言之,冯的离开对潘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潘汉年和冯雪峰有矛盾是很明显的,看来跟冯雪峰与博古吵架一事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之间主要不是观点冲突,而是人事矛盾,即他所谓“对组织有些意见”,但冯雪峰也的确对“时局”有他的看法。

据楼适夷回忆,1937年楼刚出狱回上海,冯雪峰去看他,并告诉他:“他们有些人,一心要当国民党的新官了,我可不干,还是回老家。”^③冯雪峰1937年“请假”回义乌,其中原因包含对中共政策的意见,应该没有疑问,可以令人对冯的政策水平提出疑问。秋石认为,“由此可见,在冯雪峰心底深处,他从来没有认同过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他自己不理解,又怎样能够引导他人理解和接受呢?因而,他知道胡风另写文章另提口号来与周扬们的‘国防文学’抗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必然的”^④。冯雪峰在1937年对当时统一战线实施方式有意见,恐怕是事实,但把他1937年的认识和态度往上推演,恐怕也不符合事实。形势从1936到1937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把“联合战线”看成迎合了一些人想当官这个看法,其实有鲁迅的影响在。鲁迅就有这个观点^⑤。冯雪峰和鲁迅的确是互相影响。

七、新版“神化”的鲁迅与冯雪峰的坎坷命运

冯雪峰“请假”之后,他的“神化”鲁迅虽告一段落,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影响已经产生一定的效果。毛泽东1937年10月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可与孔子在旧社会的地位等量齐观^⑥,就是一个证明。但毛泽东的讲话没有立即发表,很可能是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1897—1984)的从中阻挠^⑦,表明中共内部早就有人不满“神化”鲁迅。但毛泽东属于例外。然而,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跟冯雪峰有很大的分歧。也许,毛泽东稍后可能发现,经冯雪峰“神化”的鲁迅并不完全,而完全的鲁迅并非毛所需要的,因此他的评价也因此必须调整。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调整的契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高度赞扬鲁迅,把鲁迅当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主要队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244—247页。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的心愿》及张晓宏:《周扬文艺活动五十周年》,载《忆周扬》,第61—62、502—503、624页。而冯雪峰本有调走周扬的意思,见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79—80页。另,胡乔木也是冯雪峰经手送到延安的,到达时间是1937年7月。冯有没有可能为周扬去延安一事与潘冲突,待考。

② 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248页。冯雪峰离开时给潘汉年一封信,潘汉年转述四点,其中说冯“对组织有些意见”,却没有提时局政策方面的问题。

③ 楼适夷:《雪峰啊雪峰》,《话雨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6页。

④ 秋石:《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⑤ 张钊贻:《重读〈出关〉的现实寓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⑥ 毛泽东:《论鲁迅》(1937),《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4页。

⑦ 据徐续红考证,有迹象显示,当时正是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有意忽视毛泽东的鲁迅讲话(《毛泽东〈论鲁迅〉为什么没在延安首发?》,《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成仿吾从未改变对鲁迅的反对态度(见阎焕东:《成仿吾晚年谈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8期)。

伍之中拿笔队伍的司令^①，但鲁迅的文艺观，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表达的意见，明显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比较突出的是杂文问题。杂文问题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些更根本的分歧，即以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个鲁迅“文学运动”的传统^②。

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核心思想之一。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中就认为，鲁迅用文学“医治中国人的病态的精神”，“这个解放民众个性的见解，远超过当时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的思想”^③。当时在延安鼓吹杂文的作家，也无不认为这是鲁迅的文艺传统。萧军就认为，作家有改造人们灵魂的任务，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毛泽东虽然也说人民大众有缺点应该克服，但认为工农比知识分子“干净”，那么作家又有什么资格去改造人民大众的“国民性”呢？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等人“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知识分子需要先跟工农“打成一片”，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才能够为工农服务^④。而所谓“改造”，包括所谓鲁迅的“转变”，就是要“投降共产党”^⑤，要在思想上“完全缴械”^⑥。也就是取消个性、独立性，亦即作家的灵魂。

也许是在座谈会上看到“鲁门弟子”的表现和反应，《新民主主义论》可能最令他们激动的那句话：“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便逐步改变。1949年，周扬在一次讲话中把方向问题谈得很清楚，指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⑧。《讲话》的方向，自然也代表在党领导下“鲁总司令”所代表的方向，但这个“鲁总司令”恐怕并非完全是以鲁迅著作文本为依据的，而以鲁迅著作文本为依据的方向，恐怕在有些人眼里，却是“错误的方向”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民主主义论》那句话，更遭译成“鲁迅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道路”^⑨。所谓“鲁迅走过的道路”，显然是以前“左联”中反对鲁迅的言论，即“不必重复”的“已经过去了的路”的翻版^⑩，也就是朱德所谓彻底“转变”的“投降”。如果冯雪峰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评价的产生，真的起过作用，这句话翻译的篡改，可以说是他“神化”鲁迅努力的彻底否定。据说，冯雪峰在20世纪30年代曾兴奋地说，有了

① 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目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已删去这句话。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演变和直接背景，参考金宏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与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② 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一贯思想，见 Chiu-yee Cheung, “Lu Xun’s View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Was There Really an Epistemological Break?”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XI (3) (September 2012): 410—425.

③ 《雪峰文集》第4卷，第22页。

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第38—39、64—65页。

⑤ 《记延安文艺座谈会》，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4页。据刘白羽回忆，朱德是在第二次座谈会上作了上述发言，见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⑥ 《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11月30日，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第4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664—667页。另有王纪一据何其芳、欧阳山尊、周立波等人回忆整理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⑦ 参考《胡风全集》第6卷，第611、664、675、685页。

⑧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2卷，第513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91页。官方译文“The road he took was the very road of China’s new national culture.”见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I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372. 这个英译本出版于1954—1956年间(London: Lawrence & Wishart)，是英共和中共协调翻译出版。负责《毛泽东选集》翻译的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的主持人是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4—85页）。笔者所见最早英译为《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杂志1941年1月15日刊登的版本，原题为《新民主的政治与文化》（“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New Democracy”），后在澳洲悉尼出版过单行本（*China’s New Democracy* [Sydney: Current Book Distributors, 1945]）。这个版本译文为：“Lusin’s direction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⑩ 周文：《鲁迅先生与“左联”》（1940），《周文文集》第3卷，第351页。按：由此观之，胡乔木试图把1981年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向1958年版的旧注靠拢”，也就并不奇怪了（见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293—296页）。

毛泽东,鲁迅“后继有人”了,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就认识到,《讲话》的基本精神与鲁迅精神是对立的了^①。1946年左翼文艺界已广为推行《讲话》精神的时节,冯雪峰还写了《题外的话》,对政治标准第一的政策委婉地提出批评,结果遭到何其芳的批评^②。而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鲁迅,在21世纪初“假如鲁迅还活着”的讨论中,已有清楚的展示^③。

1946年9月,冯雪峰出版杂文集《跨的日子》,并托丁玲(蒋伟,1904—1986)转送一本给毛泽东,据丁玲1948年6月19日日记:“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④毛泽东对冯雪峰已表现不满。新中国成立之后,冯雪峰担任了鲁迅著作编刊社的社长和总编,准备出版注释版《鲁迅全集》,并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其中以论文《党给鲁迅以力量》(1951)和回忆录《回忆鲁迅》(1952)影响较大。1951—1952年间,毛泽东多次对胡乔木表达了对冯雪峰的不满,胡乔木向毛泽东推荐冯雪峰《回忆鲁迅》,毛泽东看后认为“这本书水分太多了,实在的东西不多。”又在差不多同时批评冯雪峰“为什么现在写的文章这么别别扭扭?”^⑤冯雪峰在1956年把《回忆鲁迅》删了将近一半,只留记事,不要议论^⑥,是否由毛泽东的批评所致,无法确证,但可能性很大。

1954年冯雪峰在转载批判俞平伯的稿件上加上《编者按》,内容受到批评,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书上写了批注,说他“浸入资产阶级的泥潭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去批判他^⑦。1955年,周扬在向毛泽东汇报批判胡风计划时,说冯雪峰因《文艺报》受批评心里很痛苦,毛泽东答:“我就是要他痛苦!”^⑧

1957年8月《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刊发《冯雪峰是文艺反党分子》的批判文章,9月冯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初“定案”,4月开除出党,到1961年11月摘帽^⑨。但摘帽不等于平反,冯雪峰还是“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据薄一波回忆,1962年7月统战部曾几次提出对“右派分子”(包括摘帽“右派”)进行甄别,未获中共中央同意。不过,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毛泽东看到消息后非常震怒,发下批语:“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⑩

“文革”期间,由于周扬等遭到批判,冯雪峰成了整人者挖掘材料的宝藏。尽管冯雪峰与周扬等有历史恩怨,后来受尽委屈,但他还是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交待事情原委,为还原真实的鲁迅留下宝贵的资料。这是他“神化”鲁迅的最后努力,也是他抵制另一种“神化”鲁迅的最后努力。

① 《人间鲁迅》座谈会上牛汉的发言,《读书》1998年第9期,第98页;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6卷,第332页。

② 《雪峰文集》第2卷,第365—368页;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1946),《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1942—194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357—361页。

③ 参看陈明远编:《假如鲁迅活着》,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

④ 丁玲:《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段》,《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⑤ 胡乔木:《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载《胡乔木谈文学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对照唐弢:《追怀雪峰》,载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据唐弢文,冯雪峰没有收到胡乔木任何复信。

⑥ 倪墨炎、陈九英:《本书编辑说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9—10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于光远对毛泽东的批评有很精到的分析,指出毛泽东批评胡适、冯雪峰是在意识形态上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部署,此前的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是反封建主义(《我与周扬》,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31页)。

⑧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另据朱汝璜《1951—1978中国文艺界辑略》,毛泽东又在1957年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91页)。但查日本小仓编集之《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原文复刻),毛泽东只提萧军和丁玲,没有冯雪峰(第76页)。

⑨ 据包子衍:《冯雪峰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96—202页。

⑩ 事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1—1042页。毛泽东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八、结束语：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功绩

中共内部及左翼阵营中存在对鲁迅相反的态度，冯雪峰在“神化”鲁迅方面，对景仰鲁迅的人们，自然是很大的支持。1936年胡风从冯雪峰处已知道毛泽东对鲁迅评价很高，但语焉不详，1938年看到毛泽东纪念鲁迅的讲话，就非常高兴，原因是当时一些人轻视、敌视鲁迅^①。虽然仔细阅读毛泽东“神化”的鲁迅，就可以发现这个鲁迅跟冯雪峰和胡风的鲁迅，其实是并不一样的。

冯雪峰“神化”鲁迅，无论是对中共革命事业本身，还是对中国思想、精神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都有很大的功绩。就以“两个口号”论争为例，撇开鲁迅与冯雪峰对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质疑冯雪峰提出新口号是否符合当时中共政策，实际上是质疑冯应不应该维护鲁迅作为进步文艺界盟主的地位。如果没有冯雪峰支撑鲁迅的盟主地位，那么鲁迅这个“统战对象”，很可能就会因为不参加文艺家协会而丧失价值，甚至会被定性为破坏联合战线的托派分子，而鲁迅及以鲁迅为中心的党内外作家，也就有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可能，鲁迅对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无法为统一战线所利用^②，所谓统一战线也就形同虚设。但坚持鲁迅的旗帜也只是当时一时之利。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能够将一个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进步思潮的思想家，结合到左翼阵营，成为左翼思想和文化的导师之一，实际上为左翼进步力量增添了一个深邃的精神资源，这是冯雪峰的大贡献之一。例如，中共在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内战，实为帝国主义“清道夫”，而鲁迅从“国民性”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受外族入侵历史中奴才的产生，得出相同的结论^③，不能不说是使帝国主义“清道夫”这个根据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增添了中国历史文化甚至心理的维度和深度，更具有现实性，更值得深思，更能刺激人们的思想活力。由于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心理和精神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得出的左翼理论，超出了“正统”马列主义或僵硬的斯大林主义及庸俗社会学的范畴，使他的思想跟反省苏联问题的左翼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有可以媲美的地方，使他的思想不单具有深邃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具有现代世界的未来意义。没有冯雪峰帮助鲁迅理解和接受中共的路线政策，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使之成为左翼文学文化的精神领袖，没有冯雪峰向中共领导层的正面推介，鲁迅在1949年后中国的存在和影响，恐怕就要大打折扣，如果还能存在的话。“喇叭”和“留声机”是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的。新中国精神文化如果没有鲁迅，将是莫大的损失。

当然，冯雪峰“神化”鲁迅如果只停留在树立偶像的层次，他的贡献不会很大。但他“神化”鲁迅除了使鲁迅更能为中共上下所接受之外，还使鲁迅研究成为新中国的“显学”。这“显学”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尽力保留和出版鲁迅的文本，还有众多有关的回忆录和史料^④。即使在“文革”期间，鲁迅的作品也能广泛流传，滋润荒芜凋零的文化园地，让人们精神上还能喘一口气，并以白纸黑字的沉默方式，如实地传播他的思想和精神，打破对他的种种改造和塑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作家、思想家能出真正意义的全集，只有鲁迅，可谓奇迹。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神化”的鲁迅背后其实保护着真实的鲁迅。

① 胡风：《一点回忆》（1981），《胡风全集》第7卷，第39页。

② 周扬等对不支持他们的作家都一律批评，参见《国防文学问题》中何家槐的意见及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18、231页。

③ 《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2月9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51—52页；另参考拙著《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有关异族入侵制造的奴才的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7—221页）。

④ 冯雪峰对十卷注释本《鲁迅全集》及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倾注大量心血，在文本校勘和注释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为未来的版本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限于当时环境，鲁迅的书信相当一部分不能出版，译文集也有删改和故意刊漏，主要是涉及托洛茨基的地方（见止庵、王世家：《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答问，《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8期）。

鲁迅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虽出自毛泽东的文章，应该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其中有冯雪峰“神化”的功劳。中共内部一些人设法改变以鲁迅为代表的方向^①，终于没有得到认同。所谓“方向”，自然是面向未来，鲁迅也就成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而真实的鲁迅，是个具有独立精神，实事求是，敢于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抗争，而又具有韧性战斗和清醒现实主义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

鲁迅常常被反对者批评为心胸狭隘、性情褊狭，并不符合事实。就在处理“左联”的许多事情上，鲁迅的表现都是胸怀宽广，对人非常宽容。例如，丘东平是“左联”少数公开反对鲁迅的人，当年批判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参与者，而且是直署真名。但鲁迅却不计前嫌，向国外推荐他的作品^②。又如，徐懋庸是跟随周扬的，为办“左联”刊物向鲁迅募捐，鲁迅因不信任周扬会真的办刊物，所以多次拒绝，后来刊物办成，鲁迅立即寄款资助^③。再如，胡风大约批评了叶紫，但鲁迅认为“叶君他们，究竟做了事的，这一点就好”^④，非常宽容。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其中一点就正是因为周扬不“认真做事”^⑤。

鲁迅被当成棍子，对事对人好像都只有负面的批评。这也不符合事实。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过：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⑥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些“脊梁”并不限于当时“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⑦，而是包括古今中外，不分阶级的一切“庄严的工作”者^⑧。把鲁迅当成棍子，只是另一种“神化”鲁迅的目的。

冯雪峰“神化”了鲁迅，因此保护了真实的鲁迅，而这个真实的鲁迅，在人格上是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新人”的模范，是各种投机和随风倒的“聪明人”的障碍；在思想上是中国人精神革命的利器，是纯粹功利唯物论的救赎，的确是中国新文化的一种值得重视的方向。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

[责任编辑 曹振华]

① 例如周扬，见其《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载《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3页。

② 鲁迅和茅盾选了东平的《通讯员》，推荐给伊罗生（Harold R. Issacs），收入英译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出版，没有成事，1974年才在美国出版。见鲁迅、茅盾选编：《草鞋脚》，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Harold R. Issacs ed., *Straw Sandal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4)。

③ 《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1—83页。

④ 《致胡风信（1935年8月24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4页。参考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第98—100页。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1、534页。

⑥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⑦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589页。

⑧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88页。